

单季创造GDP超5000亿元、排名保住全国前十

武汉交出“大战大考”答卷

本报记者 张家振 武汉报道

“2020年,极不平凡、极其艰难、极为难忘。”

2021年1月29日,武汉市第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开幕,新走马上任的武汉市市长程用文在《政府工作报告》:武汉抗疫保卫战、防汛保卫战、疫后复苏保卫战“三战并举”,夺取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2020年初遭受疫情的严重冲击

冲刺保级

尽管武汉市全年GDP增幅为负,但成绩好于预期,“练好内功、全力追赶的武汉,在今年反超杭州重回第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经历疫情大考后,武汉交出的“成绩单”更具含金量。

2021年2月2日,武汉市统计局发布《2020年武汉市经济运行情况》:根据湖北省州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初步核算,2020年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15616.0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下降4.7%,降幅比一季收窄35.8个百分点。

“经受了艰苦卓绝的疫后大考,稳住了经济基本盘。”程用文在2021年1月29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总结武汉取得的疫后重振“经济保卫战”成绩。这距离程用文

一主引领

大疫之下,我们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兜牢了民生底线,孕育了发展机遇,付出了艰辛努力。

“总的来看,2020年全市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明显。大疫之下,我们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兜牢了民生底线,孕育了发展机遇,付出了艰辛努力。”武汉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武汉市市长程用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1年武汉市要拿出鼓足“主战场”的豪情和干劲,并确立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的主要预期目标。

可供对比的是,杭州和南京确立的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预期目标均为增长7%,成都市市长王凤朝在2月4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也提出,2021年预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的目标。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的目标,武汉市制定了高增长路线图: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变成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聚焦“965”产业集群(打造9大支柱产业、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加快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加快“一主引领”成势见效,发挥“主引擎”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发挥“一主引领”的“主引擎”作用,也是湖北省为武汉市确立的

目标任务。在湖北省“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中,武汉发挥着辐射带动武汉城市圈乃至全省发展的龙头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20年12月初召开的湖北省十一届八次全会上,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曾直指“武汉最大的问题不是‘一城独大’,而是‘大而不强’”。

此后,王忠林在《湖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为武汉突出“一主引领”、更快“做大做强”开出了综合实力要强、产业实力要强、科技实力要强的“药方”。

湖北省政府研究室主任覃道明分析认为,相较于其他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在区域整体联动发展

上具体举措不够,一体化进程缓慢。此外,武汉仍面临“大而不强”问题,城市发展能级不够,辐射带动力不强,这既不利于武汉自身发展,也难以向周边城市辐射扩散。

武汉市政协委员、楚商联合会副秘书长、楚商智库负责人王涛告诉记者,按照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定位要求,武汉要在做大做强城市

发展能级上聚焦发力,必须打好“做大总量”和“做优质量”两张牌,要在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强化枢纽功能三个点上持续发力,长板做得足够长,短板尽全力补,向外借力,向内挖潜,培育持续引领的动能。

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区域发展布局中发挥“领头羊”作用。

多位当地政商界观察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武汉市过去一年打响的重振“经济保卫战”成效显著,在国内甚至全球都具有风向标意义。地区生产总值出现下滑,在“全国十强”城市排名下滑一个位次可以说是预料之中,但随着疫情平稳后重振举措持续落地见效,武汉恢复到既有排名甚至有所前进也不会在意料之外。

2020年在位居全国十强城市的同时,短暂被杭州超越,从去年的第八名滑落至第九名。不过,武汉市在第四季度实现了GDP单季增长5096.4亿元,成功实现了对南京的反超,最终领先超过8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也是全国十强城市中唯一负增长的城市。在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看来,尽管武汉市全年GDP增幅为负,但成绩好于预期,“练好内功、全力追赶的武汉,在今年反超杭州重回第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2020年在位居全国十强城市的同时,短暂被杭州超越,从去年的第八名滑落至第九名。不过,武汉市在第四季度实现了GDP单季增长5096.4亿元,成功实现了对南京的反超,最终领先超过8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也是全国十强城市中唯一负增长的城市。在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看来,尽管武汉市全年GDP增幅为负,但成绩好于预期,“练好内功、全力追赶的武汉,在今年反超杭州重回第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2020年在位居全国十强城市的同时,短暂被杭州超越,从去年的第八名滑落至第九名。不过,武汉市在第四季度实现了GDP单季增长5096.4亿元,成功实现了对南京的反超,最终领先超过8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也是全国十强城市中唯一负增长的城市。在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看来,尽管武汉市全年GDP增幅为负,但成绩好于预期,“练好内功、全力追赶的武汉,在今年反超杭州重回第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2020年在位居全国十强城市的同时,短暂被杭州超越,从去年的第八名滑落至第九名。不过,武汉市在第四季度实现了GDP单季增长5096.4亿元,成功实现了对南京的反超,最终领先超过8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也是全国十强城市中唯一负增长的城市。在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看来,尽管武汉市全年GDP增幅为负,但成绩好于预期,“练好内功、全力追赶的武汉,在今年反超杭州重回第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CDL内斗绿地起诉 协信远创“祸起萧墙”

本报记者 郭阳琛 童海华 上海报道

2021年,对于重庆协信远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信远创”)而言注定不会太平。

一年前,协信远创创始人吴旭迎来了“旧相识”郭益智。郭益智掌管的城市 Developments Ltd(以下简称“CDL”)豪掷近44亿元,一举成为协信远创的第一大股东。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笔CDL在华最大投资却引发董事会内部郭益智和郭令柏的叔侄相争。

这笔交易的另一大副作用,是让人入股协信远创已有4年的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606.SH,以下简称“绿地控股”)萌生去意。《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绿地控股不仅在5个月前将所持股份质押给广西国资委,2021年1月14日,还与协信远创就股权转让纠纷展开民事诉讼。

绿地控股方面书面表示,由于涉及诉讼及不干扰司法公正,相关情况请以官方公开信息为准。针对主要股东的动荡,协信远创方面向记者表示,受疫情的影响,目前经营发展的确存在一些困难,但无论是股东方还是经营团队的职业经理人,都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CDL、绿地、债务、业绩……如今的协信远创和吴旭无疑已沦落到“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吴旭又能否安然度过乌江呢?

大股东叔侄决裂

CDL母公司是创立于1964年的丰隆集团,是新加坡最大的房地产和酒店业投资发展商和标杆企业,也是世界跨国性的集房地产、银行与金融服务、酒店等综合类的企业集团,其背后是新加坡首富郭令明家族。

郭令明的儿子郭益智负责郭氏家族在中国市场的房地产业务,也正是他化身“白衣骑士”主导了一年前的CDL对于协信远创的收购。

2020年4月,CDL以43.9亿元获得协信远创51.01%股权。其中,27.5

四年之痒

而在CDL之前,绿地集团也曾扮演过协信远创的“救世主”。

时间拨转至2016年11月,绿地控股宣布拟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收购协信远创40%股权,交易价格为49.666亿元,当时并列成为协信远创的第一大股东。

但随着CDL的入局,绿地不但失去了协信远创大股东的头衔,一下成为仅持股19.9%的第三大股东,相应股权对应的市价

为14.77亿元,相比四年前的投资折

协信路在何方?

作为渝派房企的“五朵金花”之一的协信远创,6年前签约销售金额首次突破百亿元,但之后却转而“失速”,并陷入债务泥沼。

截至2020年上半年,协信远创营业收入为20.5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08%;净利润为亏损12.5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93.80%。

毛利率较低是协信远创的另一大问题。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协信远创房产销售板块收

入为17.23亿元,毛利率11.39%,远远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协信远创的债务压力也较大。截至2020年上半年,借款总额达355.8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天眼查显示,2020年11月,协信地产两次成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总计近200万元。其中一项是因设计费拖欠5年,该案诉讼方表示,作为一家规模房企,协信地产可查封冻结的账

户内现金资产不足150万元,对此非常感到意外。

诸多不利因素,也让协信远创的规模排名不进反退。克而瑞榜单发布的数据显示,协信远创2020年销售额为268亿元,排名第96位,而2017-2019年销售金额分别是195.5亿元、272.5亿元和220.2亿元,这也意味着2015年曾提出2020年前销售破千亿元的目标也随之破产。

面对困境,除了引入投资方,协

信财务与会计部高级副总监。

但让郭益智意想不到的,是这笔“划算的抄底”竟然引发了家族核心成员的对立,以郭令柏为首的3名董事会成员相继因此辞职。在辞职信中,郭令柏坦言,“与董事会和管理层就集团对协信的投资及其继续向协信提供财务支持存在分歧”。

郭令明则在一封公开信中直言,最近多名董事离职是重整董事会的机会。他承认,在商业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看待对协信的投资,“疫情”的全球蔓延让这笔投资更具有挑战

性。但据彭博社报道,CDL正在内部讨论出售协信远创持股,并进行债务重组。

对此,协信远创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受疫情的影响,目前远创的经营发展的确存在一些困难,但无论是股东方还是经营团队的职业经理人,都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相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这边请示了大股东新加坡方面,他们也(对此)很认真。因为CDL是上市公司,对数据的披露比较敏感,所以很多问题无法现在回答。”

“我们这边请示了大股东新加坡方面,他们也(对此)很认真。因为CDL是上市公司,对数据的披露比较敏感,所以很多问题无法现在回答。”

“我们这边请示了大股东新加坡方面,他们也(对此)很认真。因为CDL是上市公司,对数据的披露比较敏感,所以很多问题无法现在回答。”

“我们这边请示了大股东新加坡方面,他们也(对此)很认真。因为CDL是上市公司,对数据的披露比较敏感,所以很多问题无法现在回答。”



2021年1月31日、2月1日,政协武汉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分别举行闭幕大会,2021年武汉市两会落下帷幕。 本报资料室/图

大而不强

武汉市要带着“小兄弟们”们一起发展,共同打造数字经济产业集群,通过点线相结合的方式,串珠成链,将“一城独大”“星星点点”逐步变成“众星拱月”“繁星满天”。

武汉市在湖北省区域发展布局中更好地发挥“一主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着力点在武汉城市圈、突破口在武鄂(武汉、鄂州)协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城市圈协同联动特别是武鄂协同发展也成为2021年湖北省及武汉市和鄂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汇。例如,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武汉城市圈协同发展,要加强公共服务共享,推动教育、医疗、社保、文化、旅游等的同城化发展。

鄂州市市长陈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将“区域协同达到新高度”列为今后五年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坚持区域协同,加快建设武鄂同城化核心区。具体举措包括:推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与鄂州葛店开发区、红莲湖旅游度假区、梧桐湖新区联手共建“园外园”;推动鄂州花湖机场片区、中部电商基地、三江港片区纳入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打造葛店——红莲湖——梧桐湖科技创新轴,协同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等。

随着武汉特别是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向东发展的腹地日益受限,武汉与鄂州融合发展正进入加速

通道。作为与武汉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对接的桥头堡之一,居于武汉、鄂州两市交汇融合中心、总投资90亿元的红莲湖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园已于2020年7月开工建设,将主要引入云计算与大数据、5G通信、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承接光谷产业外溢。

“武汉城市圈和同城化所带来的成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切身感受。”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教授丁永玲也建议,推进同城化发展一方面要避免同质化,武汉与周边地区要分层统筹推进,协调发展,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武汉加快建设圈内战略统筹机制,加大顶层设计力度,建立高规格推进武汉城市圈协调发展的相关机构。

王涛告诉记者,武汉市要在湖北省内特别是武汉城市圈内发挥“大哥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为主线,引领有基础的省内城市进行特色产业协同配套,带着“小兄弟们”们一起发展,共同打造数字经济产业集群,通过点线相结合的方式,串珠成链,将“一城独大”“星星点点”逐步变成“众星拱月”“繁星满天”。

上述负责人说。

大股东上演“宫斗剧”,对于本就深陷债务泥沼的协信远创会影响几何?在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法学会不动产法研究会理事王玉臣看来,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管理层的变动和公司策略、重大决策的变化。股东对公司实现管理往往是通过和管理层的控制来实现的,直接展现公司策略和重大决策上。正所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从长远影响来看,大股东的变动可能导致公司未来发展产生变动。

状将包括协信远创在内的多家“协信系”公司告上上海金融法院,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同为被告的还有上海银行漕河泾分行。

“主要股东起诉企业不多见,但是也时而有之。”王玉臣认为,往往是由股东对管理层的失控或矛盾产生的。当主要股东觉得自己的意志无法体现,公司高管已不再受自己的控制,不再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甚至已经伤害股东利益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纠纷或诉讼。

后坐稳狮头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宝座”,但最终也无疾而终。

“考虑到协信控股股东最近的一些纠纷,上市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小了。”行业分析师严跃进认为,此前绿地和CDL先后持股,为协信远创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大股东CDL存在内部分歧,绿地控股还和其有司法纠纷,一些经营问题也随之显露,上市压力就会比较大。